

仅供内部参考

美中关系的 现状与前景

译自〔美〕哈里·哈丁 著《美国
和中国1972年以来的脆弱关系》

新 华 出 版 社

D 829.772
18

84858

美 中 关 系 的 现 状 与 前 景

〔美〕哈里·哈丁 著

柯 雄 钟建国

邸秀琴 张胜平 译

白景山

新
华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110号

美中关系的现状与前景

译自〔美〕哈里·哈丁著

《美国和中国1972年以来的脆弱关系》

柯 雄 钟建国 邸秀琴 译
张胜平 白景山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125印张 135,000字
1993年2月第一版 1993年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1788-8/D·328 定价：4.25元

(限国内发行)

编 者 的 话

1992年春末，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出版了该会高级研究员、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哈里·哈丁的《美国和中国1972年以来的脆弱的关系》一书。这是在美国当前调整对华战略的背景下，在美国发表的第一本分析美中关系的长篇专著。我们现在给读者提供的《美中关系的现状与前景》，就是从哈丁这本书中节译出来的。

哈丁研究中美关系多年，曾多次访华，与我国一些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均有交往。他这本书写出初稿后，还通过布鲁金斯学会这个美国的高级智囊团征求过美国学术界和政界一批知名人士的意见。因此，在目前美国关于对华政策的辩论中，哈丁这本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值得注意。

哈丁在这本书中系统回顾了中美关系自1972年至1991年的几起几落的过程，分析了这种关系起伏的背景和当前存在的实质性问题，对两国关系的前景作了估计，并就美国应怎样“重新设计”其对华政策，提出了建议。他认为，美中两国很难重建70年

代那样的战略结盟，也不大可能恢复80年代那样的经济伙伴关系。相反，在贸易、人权、军售、台港等问题上，两国关系会继续呈现紧张，以至不时发生对抗。然而，两国在安全、商业、科技文化交流以及某些全球性和地区性问题上，仍互有需要，必须处理好彼此之间的“脆弱的关系”，避免回到50年代和60年代那种相互为敌、疏远隔绝的状态。

哈丁强调指出，美国领导人必须认识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在国内事务中既不实行多元化，也不实行极权化；既进行富有意义的经济改革，又不完全采纳资本主义或放任自由的经济理论”。美国要抛弃以往那种认为中国非友即敌的简单化看法，与中国建立“更现实一些和成熟一些的关系”。既然两国利益有共同的一面，又有相互竞争的一面，两国关系只能是“合作、竞争和冲突的混合体”，要建立在“艰难的讨价还价的基础之上”，美国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应对中国“动用正反两面的刺激手段”。哈丁认为，这才是美中两国应有的“正常的关系”；相反，美国若不调整好它的对华政策，就会“重新陷于欣喜若狂与幻想破灭的循环，其代价将是高昂的”。

作为一位美国学者，哈丁分析中美关系的立场和观点自然有其局限性，尤其是他对中国情况的看法不可避免地带有片面性和阶级的偏见。然而，与某些美国学者相比，哈丁的治学态度是比较严肃的，看法是比较清醒的，而且他这本书中包含的资料是相当丰富的。

哈丁这本《脆弱的关系》全书共10章，加上附录，约合中文40万字。现在，我们从该书中节译了第一章《概述》、第八章《僵局》、第九章《前景》和第十章《重新设计美国的对华政策》，以及该书附录的12个统计图表和8个文件，冠以《美中关

系的现状与前景》的标题，作为内部参考资料，仅供各级领导干部和研究单位参考。

编 者

1992年8月

目 录

第一章	概 述	(1)
	二十年的演变	(6)
	变化的背景	(10)
	实质性问题	(14)
	政治基础的变化	(18)
	前景与建议	(22)
第八章	僵 局	(26)
	华盛顿1989年底主动采取的行动	(30)
	关于中国最惠国待遇的第一次辩论	(40)
	波斯湾危机	(50)
	关于中国最惠国待遇的第二次辩论	(57)
	布什的第二项战略	(62)
	范围更广的关系	(66)
	情绪	(73)
第九章	前 景	(81)
	重新结成战略联盟	(87)

与分裂的中国各个部分保持不同的关系·····	(90)
重新在中国改革中建立伙伴关系·····	(92)
再度对抗·····	(99)
关系紧张·····	(106)
结 论·····	(109)
第十章 重新设计美国的对华政策 ·····	(112)
安全·····	(119)
商业·····	(124)
人权·····	(130)
台湾和香港·····	(135)
学术和文化交流·····	(140)
全球日程·····	(144)
同中国的新关系·····	(149)
附录一 图表	
表A—1 美国舆论对中国的看法·····	(153)
表A—2 1971—1990年美中双边贸易·····	(155)
表A—3 1971—1990年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 的构成·····	(157)
表A—4 1971—1990年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 的构成·····	(159)
表A—5 1979—1990年进入美国的中国学生 和学者人数·····	(161)
表A—6 1980—1990年到中国的美国人数 ·····	(162)

表A—7	1978—1990年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	(163)
表A—8	1978—1990年台湾与大陆之间的贸易	(165)
表A—9	1986—1990年台湾到大陆的旅游人数 和投资.....	(167)
表A—10	1972—1990年美国对台湾的军事销售	(168)
表A—11	1972—1990年美国对中国的军事销售	(169)
图A—1	对中国持赞成看法的美国人的百分比	(170)
附录二	上海公报	(171)
附录三	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文件	(176)
附录四	关于美国向台湾销售武器的文件	(179)

第一章

概 述

1972年2月21日,在北京的首都机场,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出现在空军一号飞机的舱门,开始沿着舷梯走向停机坪。按照尼克松的吩咐,他的一名助手挡住了机舱里的过道,不让别的官员们跟随得太紧。这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这位美国总统就会改变全球力量对比使之有利于美国,并帮助美国体面地撤出越南,促进与苏联缓和的前景。尼克松决心不让别人分享这样一项成就。

在舷梯下等候着尼克松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成立以来一直担任总理的周恩来。对于周来说,这也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时刻。自从他的政府建立以来,美国一直拒绝正式承认它的存在。两国间有过断断续续的大使级的接触,仅此而已。美国禁止了它的全部对华贸易,并且始终坚持把中国排斥于联合国之外。美国总统此刻来到,就是承认了那一战略的失败,从而使周、他的政府以及整个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得到确认。

尼克松看到周恩来在轻轻鼓掌,想到有礼貌的中国人总是以鼓掌回答鼓掌,就在下飞机的时候也开始拍手。当他见到在停机坪等候他的其他中国官员谁也没有拍手时,就停止了拍手。尽管这

时离舷梯的最低台阶还相当远，他已经把手伸向周恩来。登上地面后，他握住周的手，握手的时间比通常长一点。尼克松这样明确而又富有戏剧性地显示出他愿意与这位中国总理握手，其用心在于要为一桩往事作出补偿：在1954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曾明显拒绝同周恩来握手，因这一冷落而受到伤害的周对此事一直忿懑不已。

尽管尼克松和周恩来在他们第一次相见的时候一定都感到满足，但这一场合仍然是尴尬的。为这次来访已作了大量准备工作，其中包括亨利·基辛格与周恩来和毛泽东的长时间晤谈，可是尼克松在中国究竟会受到什么样的接待，美国人仍然没有什么信心。基辛格曾担心一种危险，即中国人到头来也许仍然情不自禁要羞辱总统。在国内，按一次民意测验的结果来看，多数公众担心尼克松访问中国会“受到愚弄和堕入圈套”。

最初，这些忧虑似乎显出是有理的。到达的仪式是安排在在美国电视收视高峰时间实况转播的时刻。然而，使美国先遣人员惊愕的是，在机场没有欢迎总统的中国人群。只有一支中国的仪仗队，它确实比一般的仪仗队大一点，可是欢迎仪式按基辛格的说法是“严格简朴无华的”。从机场乘车穿过北京市中心到钓鱼台宾馆的一路上，美国人也感到失望。中国人不但没有出动群众来欢迎总统，而且实际上还在车队经过的路线上把好奇的旁观者挡开。尼克松手下的人曾希望让美国电视观众看到一些“上镜头的中国大众场面”，结果什么都没有。此外，还有一件事使总统的特工小组懊恼：总统被迫乘坐了总理的红旗牌轿车，而不是乘坐专门从白宫车队送过来的汽车，因为中国人拒绝让尼克松使用一辆美国汽车来与周恩来同行。

这样一个意义重大的场合所浸透的尴尬气氛反映了1972年两

国之间的鸿沟。沿着中国东部边界，从北到南，一处又一处部署着美国军事力量，其目标在于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遏制中国的影响。中美两国军官仍然在板门店参加停战委员会的会议，那是两国20年前在朝鲜半岛打的一场不分胜负的战争的见证。美国跟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保持着外交关系和一项安全条约，而那个与北京敌对的政权是1949年被共产党赶出去的，可是它仍然不时宣称要收复大陆。在台湾还驻有美军部队，其部分目的在于防止共产党可能实施的进攻。再往南面，在越南，美国正在同中国的一个盟友作战，美国飞机轰炸着中国兵站和供应线，中国的高射炮向这些飞机开炮还击。

把两国分隔开的，还有历史和文化上的差距。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则是世界上最穷的共产党国家之一。美国比任何其他西方国家都更加高度地体现了个人自由、政治多元和经济机会，这些概念对中国都是格格不入的。中国刚刚越过它的“文化革命”的高潮线，那场乌托邦式的、徒劳的运动是想要给中国老百姓灌输集体主义、禁欲主义和不断阶级斗争的理想。中国人对西方帝国主义19世纪的侵犯记忆犹新，认为美国是列强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特权的主要得益者之一。许多美国人则认为中国是一支侵略性的、不理智的力量，它支持世界各地的革命运动，因而是比苏联更危险的敌人。

在两国国内，对于相互通融是否明智，也都还没有一种明确的一致意见。在中国，领导人们正日益陷入一场激烈的争夺毛泽东之后接班权的斗争，有两派重要政治力量——一派主要是军官们，另一派是激进的文官领导人——都反对向美国开放的任何做法，他们对美国的意图心存疑虑，怀疑美国的诚意。据某些中国人事后说，在北京机场给尼克松以很有节制的迎接，是因为有一

些领导人坚持认为，在中国土地上“为尼克松作宣传”是错误的。在美国，前两届政府都抵制了与中国扩大接触的建议，因为它们害怕国内的反对浪潮，特别是那些与台湾关系密切的保守反共势力的反对浪潮。仅仅在尼克松就任总统之前两年，1967年，还有90%以上的美国公众采取不喜欢中国的态度，大约70%的美国公众认为中国是对美国安全的最大威胁。

然而，尽管两国之间存在着种种差距，尽管尼克松访华的头三四个小时显得尴尬，总统的这次访问却进展得相当顺利。他抵达钓鱼台国宾馆后才几个小时，就被召去会见毛泽东。会晤中，毛泽东主席宣布他“喜欢右翼人士”，说他高兴跟美国保守派的起领导作用的代表人物打交道。这两位领导人都因为彼此坚决反对对方的政治哲学而在国际上出了名，可是他们发现他们的意识形态分歧并不妨碍他们建立关系，这一点也许使他们双方都感到惊奇。不论他们的公开姿态如何，毛泽东和尼克松都是现实政治的实干家，所以，只要他们能找到共同的利益领域，他们就希望达成和解。

使得两国走到一起的共同利益，就是他们对苏联的担忧。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联采取了持续扩充军备的做法，既扩充常规军备，也扩充核军备。它的很大一部分军事力量部署在苏中边境一带，对中国的安全构成直接的威胁。与此同时，苏联在苏美全球力量对比中正在明显地占取有利地位，而美国要继续进行这场竞争的意志正由于难解难分的越南战争而逐渐受到侵蚀。

这种情况为美中两国的和解提供了一种强烈的动力。就最大限度而言，两国可能找到一些办法来协调他们的战略态势，甚至有可能把他们的某些军力联合起来，形成反对苏联扩张的统一战

线。就最低限度而言，结束中美对抗就意味着美国和中国都不必再担心两线作战，而把这种担心两线作战的包袱转移到他们的克里姆林宫对手的肩上。因此，周恩来和尼克松在北京机场一握手，就根本改变了全球地理政治的轮廓。从战略的角度看，的确如尼克松后来所言，这是“改变了世界的一周”。

还有第二个共同利益领域使美中两国彼此靠近，尽管它不如遏制苏联扩张主义那样明显。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领导人日益愿意恢复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中断了的中美经济和文化联系。毛泽东和周恩来并不是象后来的中国领导人那样愿意看到中国完全纳入世界经济，更不曾准备提出一项强有力的经济改革的纲领。但是他们已断定中国应该结束“文化革命”强加于自己的孤立，而重新转向外部世界以获取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所需要的外国技术。与美国改善关系是这一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不仅因为它是购买美国先进设备的必要前提，而且因为它将有利于中国从美国的西欧盟国和日本进口类似的技术。

在美国也有许多人意识到恢复美中文化和经济联系的好处。学者、传教士和普通的旅游者早就迷恋着中国，会欢迎有机会到中国去从事教学、研究、布道和观光游览。美国工商界将因为能够重新进入中国市场而得益，那一市场在1946年顶峰时曾经占美国总出口值5%。这些考虑虽然不是基辛格当初策划打开对华关系时所盘算过的内容，但是它们有助于他和尼克松所设想的改变美国对华政策这一举动获得国内的支持。

由此可见，当尼克松和周恩来1972年2月在空军一号飞机舷梯下相遇的时候，他们的会见既反映出美中两国之间的巨大差异，又反映出一种比较合作的关系将会带来的潜在收益。这样一种利害关系的复杂的混合，对充满怨恨的过去的记忆以及对一种

比较有利的未来的希望的复杂的混合，为这两位领导人所开创的新联系提供了一种并不确定的基础。在这样一种并不牢靠的基础之上能够建立起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样的关系又有多大的耐久力呢？

二十年的演变

中美两国之间1972年以来二十年的关系的特点是在进展与停滞、危机和加固之间来回摆动。基辛格和尼克松先后于1971和1972年的访华构成了最初的突破，使中美关系从对抗转向合作，并且自1949年以来头一次恢复了两国高层官员的往来。在这一基础上，有可能扩大两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虽然这种联系仍然受到两个方面的阻碍，即两国尚未正式建交，毛泽东晚年的中国仍保持相对的封闭性。贸易迅速增长，但美国直接对华投资仍不可能。文化和学术界代表团的短期互访迅速增多，但两国的学者、新闻记者和学生仍不能在对方国内作长期逗留。

尼克松政府和福特政府未能完成美中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加上他们对追求美苏关系缓和感兴趣，使得中美关系在70年代中期出现严重的紧张。同样，在中国，由于四人帮在争夺毛泽东继承权的斗争中，正在为赶走比较温和的对手作最后的努力，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在1975年和1976年重新出现激进主义的抬头。中美贸易和文化交流减少了，高层往来也变成比较有争论的问题。到1976年，中美关系的最初进展让位于一种停滞感。

1978年底美中两国正式建交，标志了逐步衰退的关系出现回升。中美关系正常化之所以能实现，是因为北京和华盛顿都出现了新的领导人，他们具有灵活性，有达成协议的决心，因而把关

系推向前进。在美国，卡特政府得到了足够的政治资本，可以终止与台湾的官方关系，从台湾岛撤出美军，结束与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从而满足中国对正式建交提出的条件。在中国，邓小平已经使他的政治地位足够巩固，可以容忍美国与台湾继续保持广泛的非官方关系，包括继续向台湾销售武器。

这样一种妥协在两国都引起了批评。美国国会的许多人谴责了关系正常化的条件，并且给台湾关系法添上一段话，重申了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担义务。许多中国人反过来批评台湾关系法，指责它是对中美关系正常化协议的背叛。不过，尽管有这些批评，卡特和邓小平达成的交易还是生效了。

中美关系完成正常化以后，进入了进展与停滞的第二个轮回。1978到1980年，文化、经济和战略联系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来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出现了第一次浪潮；两国之间实现了第一次直接通航；第一批美国人到中国作商业旅游；美国派出了第一批常驻北京的记者；成立了第一批中美合资企业；第一次互派军事代表团，等等。两国公民热诚相待，两国关系发展之快超出人们的预料，于是在太平洋两岸出现了一种欣慰和振奋的心情。

接着出现了失望，两国都在摆脱对方的拥抱。在1980年的总统选举期间，罗纳德·里根宣称他要使美国与台湾的关系恢复某种官方性，这就大大背离了卡特政府在中美关系正常化时在台湾问题上作出的让步。随后，中国力图避免过于依赖美国，宣布它将遵循一种更加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从而放弃了它早先暗示过的与美国结成反对苏联的统一战线的想法。从中国回来的美国记者和学生表示失望，说中国并未实现“文化革命”的词藻所引起的乌托邦期望。北京着意批评美国社会的弊病，使这一批评成为对

国内的放宽政治限制规定一个界限的努力的一部分。

1981和1983年之间，两国关系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出现了一些刺激因素的鼓点声，就反映了这种彼此感到幻灭的情绪。这些因素包括：中国对美国的纺织品出口急剧增长；美国限制对中国的技术转让；美国有可能向台湾出售先进的喷气式战斗机；中国网球明星胡娜叛逃美国；美国投机商企图迫使中国政府偿付1911年革命前清朝为修建湖广铁路集资而发行的债券的本金和利息。美国观察家们模仿中国人爱把事物用数字串在一起的癖好，曾经把这些似乎并不大的问题归结为可笑的“三T”（纺织品，技术和台湾，英文词的第一个字母都是T）、“两HU”（胡娜和湖广的开头两个英文字母都是HU）。这些问题加上一一起，遍及中美关系的方方面面，使1978年关系正常化协议所产生的善意大为减退。的确，在1981和1982年，中美关系曾几度濒于瓦解的边缘。

幸好，两国最高级领导人作了干预，防止了关系的严重破裂。1982年，两国就美国对台湾军事销售参数达成了谅解。第二年，美国宣布进一步放宽对中国的先进技术转让的限制。由于这两个问题至少得到了部分的解决，华盛顿和北京发现它们比较容易更灵活地处理双边关系中其他的带刺激性的问题。胡娜问题被撇到了一边；湖广案件得到了解决；两国缔结了一项新的纺织品协议。作为中美联系回升的象征，两国在1984年初的4个月之内实现了不同寻常的最高级互访：赵紫阳1月访问美国，里根4月作了他的中国之行。

随着中国1984—1985年开始加强政治和经济改革，现代中美关系出现了又一个轮回。中国更加开放，大大促进了两国关系在数与质方面的发展。又有了一批第一次出现的令人兴奋的事物：在中国第一次建立了美国人投资的独资企业；两国第一次签订了